

阳和平:红旗下的“老外”

他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,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,两种思想老打架。他为今日社会上出现的拜金、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。但愤怒归愤怒,人到中年,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。他说:“有些中国人是‘香蕉’,黄皮白心;我是‘鸡蛋’,白皮黄心。”

□ Iris

国际友人

阳和平,1952年出生于北京,国际友人阳早与寒春的长子。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,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。他亲历了中国的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等重大历史事件,对新中国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。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,他多次应邀到高校作讲座,评点中国经济和新中国历史,讲述他们一家人与红色中国的传奇经历。

阳和平穿着短裤和白色背心,手里拿着一把“痒痒挠”,鼻梁上的眼镜就快要滑落到鼻尖上,慢条斯理地说着带京腔的中文。要不是大鼻子、深眼窝的“洋人”脸孔,他看起来和北京胡同里的一个普通老头儿没什么区别。

平时,阳和平不看电视,偶尔

看看连续剧,像《井冈山》、《长征》、《恰同学少年》等一批主旋律剧,他倒是全看了。

父母的故事,阳和平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人讲述过多少次了。那是两个美国人如何受到共产主义的感召到中国来寻求出路,并结为连理,留在这里继续奉献的故事。

寒春和阳早共孕育了3个子女——阳和平、阳建平、阳及平。这一家美国人,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的历史。

在中国媒体上,美国人寒春和阳早常常被描述为高尚的人、伟大的战士,他们放弃优越条件来到中国。但阳和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,他说:“我父母是到中国找出路的,对他们来说,到中国来是一次解放。”

母亲寒春,与杨振宁是同学,当年她为什么来中国?阳和平觉得,对于当时的母亲而言,中国是唯一的出路。一个1921年起就在美国对核物理进行钻研的科学家,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,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,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,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,所以必须放弃。

“文革”爆发之初,阳和平刚刚十几岁,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。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那场运动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。特别是后期对马列原著的通读,令他至今难以忘怀。

1969年,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红星工厂工作。第一年他还跟其他工人一样,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,但是后来便开始“里外有别”了,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。有一次,厂里组织学习6篇马列原著。组长说:“和平啊,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。”

阳和平说:“我想参加。”组长说:“不,你可以不参加。”

阳和平气坏了,赌了一口气,不让参加那就自己读。他花了好几年的工夫,读完了马列原著。正是这套论著,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。

“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。但是现在,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,这个事实。”阳和平说道。



幼年阳和平与父母

一颗中国心

回中国的想法很早就有了,但没有条件——孩子还小。后来孩子大了,他就又开始考虑是否回中国了。对他打击最大的,还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,他说:“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,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……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,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、打痛了,才能教育美国人民。”

阳和平问自己:“在美国呆着,有什么意义呢?”

“我所关心的东西,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,但是到哪儿去找这方面的人呢?还是得到中国来,这里毕竟还有大批研究马列主义、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专家,好多老革命还活着呢,起码跟人家聊聊,过去不清楚的、不了解的就慢慢弄清楚了。”

阳和平说:“我现在没有去美国的愿望,连去参观的愿望都没有。”在美国很孤独,到中国就不会。在中国,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,虽然也有头衔,但是两年一聘。

昔日的大环境没有了,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也缺乏知音,阳和平却在“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”课题中重新找到寄托。他不认为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了不起,尤其是与父母相比,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意义,他的趣味在于写“对社会主义的政治、经济”的感悟和思考,他决心投入其中,好好研究建国后的历史。

在中国,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“资本主义的”,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,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,因为如果那样做,他的感情“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”,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。阳和平相信,只有立场稳

定了,事情才好办。

如今,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:“我,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,既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。”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: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,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;对中国富有感情,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。

阳和平说,在美国他会觉得很孤独,到中国来就不会。但是,他觉得中国人太过“崇洋”:“价值观、审美观,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,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,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。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,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。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?”

1948年,寒春来到中国,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。次年4月,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了婚。

他们在中国养奶牛,研究农业机械化,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,闹革命,贴大字报,送子女上山下乡。甚至在新时代,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。2004年,寒春获得中国第一张“绿卡”;2009年,她还成为“感动中国”候选人。

2003年,阳早去世。2010年,寒春在北京病故,享年89岁。他们在中国相遇,也在这个国家告别。在寒春的追悼会上,跟许多参与者的激昂情绪相比,阳和平看上去则显得格外平静和理性,他在发言中说:“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,放弃了很多,其实没放弃什么,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,干自己喜欢干的事,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。”

直到现在,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:“父母那一辈子真幸运,可以不为个人的小圈子着急,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,投入到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。”(来源:北京卫视)



阳和平一家

中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碰撞

回忆自己60年的人生,阳和平两次流出了泪水。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,母亲的孤寂;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,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。

阳和平说,他至今最向往的仍然是毛泽东时代,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1977年,他曾在光华工厂呆过3个月。后来有很长时间,他一直琢磨不透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,现在总结出来了,就是因为“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”。再后来,置身美国多年,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。当然,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,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,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。

也正是因此,才令阳和平面对今天社会的种种拜金、信仰虚无现象而深感痛苦。

幸好学了马列主义,阳和平懂得“历史长河”到底是怎样的时间概念。阳和平一直记得父亲曾说过,革命斗争要有历史感、斗争感和幽默感。因为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,在中国那么长时间,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。阳和平说:“就是斗争,各种各样的斗争,人活着,社会里就有斗争,但是你懂得这个历史趋势,懂得斗争的根在什么地方,你把这看透了,看懂了,你就知道

这东西是暂时的。”

阳和平说,母亲人生的最后几年过得很悲观,对于中国曾发生的一些事情常常感到不解和失落。他便告诉母亲,眼前有些东西是暂时的。

今天一些社会现象让人愤怒。与父母一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相比,阳和平的思想之路走得曲折而艰辛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。对于眼前的一切,阳和平产生了困惑: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?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,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80年代初,阳和平觉得这话是对的,但脑子深处“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,特别混乱”。30多年以后,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“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”。

1979年,阳和平去了美国,一边做工人,一边念书,花了7年时间才毕业。1988年又开始读研究生,到1997年才拿到博士学位。

阳和平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美国。在猫王和鲍勃·迪伦的年代,他不喜欢摇滚乐,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“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,是一种折磨”。他同样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,对酒精、大麻统统“不感冒”。偶尔,阳和平也想在音乐中跳跳舞,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,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。

在美国的几十年,阳和平完全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,但他不认为那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他说:“人们总以为有车有房好像就是奋斗目标。我到美国后,车也有了房也有了。照样受压迫,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的问题,不是地位的问题。人的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与物质是两个概念。”

当年之所以选择去美国,阳和平说是因为好奇。但到了美国,他却陷入另一重迷茫。读研究生期间,他在私人公司当白领,但同时他还有一些“左派”的朋友,同时跟唐人街里的偷渡者保持联系。与好几个群体同时接触,他就好像同时生活在好几个世界里。

就在那时,阳和平经历了信仰危机,他曾经所信仰的一切都被妖魔化,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精神去反驳,只是一步步后退,好像打败仗。阳和平说:“在美国,我对社会主义,对马列主义,对毛主席,慢慢才有一个新的思路。”

阳和平并不否认,今天的中国有时让他很愤怒,他说:“黑煤窑、黑砖窑,还有强拆,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多。”

但愤怒归愤怒,人到中年,阳和平还是回到了中国。他说:“有些中国人是‘香蕉’,黄皮白心;我是‘鸡蛋’,白皮黄心。”



阳和平和学生